

# 清末广东留日师范嬗变及其影响

宋水英

(广东培正学院 外国语学院 广东广州 510830)

**摘要:**在清廷各种政策的作用下,广东省于1902年派出了首批官费留日师范生。此后,不断有学生自费负笈日本。他们来自广东各地,毕业后,或返回家乡充当教习、创办学堂,积极推动地方教育的发展和扩大专业领域知识的受众层;或进入教育职能部门,统管地方全局。此外,还有部分人利用教员之便,宣传新学、培养革命种子。他们对广东教育的发展以及广东步入近代社会的进程皆起到了不容忽视的推动作用。

**关键词:**留日师范生;教习;新学

The transmutation and influence of Guangdong normal school students studying in Japan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Song Shuiying

(Department of Foreign Languages, Guangdong Peizheng College, Guangzhou 510830)

**Abstract:** Under the influence of various policies of the Qing government, Guangdong province sent the first batch of official fee-paying normal students to study in Japan in 1902. Since then, students paid their own way basically. They came from all over Guangdong province. After graduation, some of them returned to their hometown to teach, to establish schools. They actively promoted the development of local education and expanded the audience of professional knowledge. And some of them went into the education functional departments, overall controlled of the local. In addition, there were a small number of people who took advantage of teachers' work, to promote new learning, to sow the seeds of revolution. In fact, they played an attentional role in the Guangdong education development and promoting the modernization of education in Guangdong.

**Key words:** Normal students studying in Japan; Teach; New learning

19世纪末,中国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留日运动热潮。留学生们或官派、或自费负笈东渡。留日热门学科主要分为三种:师范、法政及陆军士官。相对于后两者,留日师范的影响更为深远。为此,此论拟从相关史料,考察清末广东留日师范的兴起背景、留日师范的嬗变过程以及留日师范教育对广东近代社会带来的影响。

## 一、留日师范之兴起

晚清时期,清廷积弱已久。1895年,“天朝上国”于甲午一战中败给“蕞尔小国”的日本。翌年6月李端棻上奏“人材之多寡,系国势之强弱也……人才乏绝至于如是,非天之不生才也,教之道未尽也。”<sup>[1]8791</sup>于是,建议“令每省每县各改其一院,增广功课,变通章程,以为学堂。”<sup>[1]8792</sup>然而,学堂增设后,所需教习亦多。为解决需师孔殷的迫切问题。1898年6月,康有为上呈《请广译日本书派游学折》建议留日习师范。虽然光绪亦于同年6月下诏,呼吁留学日本,江南、湖北、四川等省选派学生赴日留学,然此时广东仍未派遣留日师范生。

1901年8、9月间,清廷“著各省所有书院,于省城均改设大学堂;各府及直隶州均改设中学堂;各州县均改设小学堂;并多设蒙养学堂。”<sup>[1]8719</sup>同时,颁发《广派游学谕》,“前据湖南、湖北、四川等省选派学生出洋肄业,著各省督抚一律仿照办理。”<sup>[1]8720</sup>并对学成回国的学生通过考试的形式赐给出身。留日师范热潮遂由此发轫。

## 二、广东留日师范之演变

粤督陶模“以时艰正急,首重人材。于一切新政,尤注意于教育。”<sup>[2]</sup>在任期间着手筹建广东大学堂、广东武备学堂。且在相关留学政策的浸润下,粤督“壬寅(1902)派吴敏恒带领学生数十人赴日本学习速成法政,以一年为期。汉民及詹宪慈、冯鸿若、周起凤等预焉。”<sup>[3]</sup>冯自由在撰写胡汉民之回忆录时写的赴日年份为1902年,而胡汉民在自传中则记为1903年<sup>[4]</sup>,但据同时期广东水师提督李准手稿《任庵自编年谱》记载:“是年(1902),陶勤肃选送子弟赴日本留学。”<sup>[5]</sup>另据《两广卒业留学生姓名录》,到东年月为“光绪二十八年五月(1902年6月)”<sup>[6]19-20</sup>,故笔者认为这批学生的抵日时间应为1902年6月。此外,冯自由回忆派学目的为“学习速成法政”,据《汇报》第392号载:“粤东派赴日本速成师范生共二十七人,督

宪特派洋务委员沈喜男大令于上月十一日护送各生至港。”<sup>[7]164</sup>因此,可判断冯自由的记忆有误,赴日目的实为习速成师范,且“数十人”为27人。这批官费生便是广东官派留日师范之始。除一人信息暂无可查外,毕业生有番禺姚礼镛(韵生)、沈诵清(养源)、沈藻清(孝芬)、李文桀(叔兰)、周祥鸾(惠生)、彭金铭(慎三)、谢祖诒(毅庄)、陈懋功(仲庄)、范公谔(寄颐)、陶效勉(诰一);香山周起凤(庆笙)、蒋禹廷(彝庵)、杨玉衡(季良);南海关庚麟(咏仁);鹤山冯博(鸿若)、易廷元(补元)、冯梁(小舟)、张淦光(镜溪);东莞朱念慈(介夫)、李滨枢(昶初)<sup>[6]19-20</sup>。未毕业者有詹宪慈(菊隐)、胡衍鸿(展堂)、庄丙汉、区彬如;南海罗汝楠、归善陈廷泰(履谥)<sup>[7]165-166</sup>。

入学月余,因发生成城学校入学事件,广东学生领袖胡汉民愤率詹菊隐、区彬如、刘伯中、庄丙汉等人退学回国<sup>[7]167</sup>。

清廷在督促各省督派学生留学日本的同时,亦鼓励自费留日。1902年10月香山萧思鹤到东京高等师范学校附属中学校习师范<sup>[8]</sup>。1904年3月,由张榕轩京卿、谢梦池观察及各绅商捐金建设的嘉应松口蒙学堂“公认提款若干,拟派梁君少慎、饶君逸梅二人前往日本习速成师范,迨卒业后授以教习之任。闻梅、饶二君,不日即束装东渡矣。…又闻梅州城,亦拟派师范生三人东渡,其款由黄京卿公度先行挪出云。”<sup>[9]102</sup>另“黄公度(黄遵宪)京卿拟创东山师范学堂,特于去岁(1904年8月)派黄君箕孙、杨君徽五二人,至日本习速成师范,现已由日本卒业回国。”<sup>[10]</sup>在黄遵宪的带领下,乡绅积极办学、助学,乡间俨然吹起了新式教育之风。据1904年11月《岭东留学日本之调查》:“何之楨(大埔)、杨维微(杨徽五)、饶真(饶逸梅)、黄之骏(黄箕孙)、梁维岳(嘉应)、林风任、林立(平远),以上入宏文学院习师范,一年卒业;沈兼任、张维岳、吴扬兰、陈耀邦(海阳)、卢浩川(潮州)、黄际遇、杜兰(澄海)、许抡魁(普宁)、黄遵庚、李任、黄璇泰、黄有则、谢延誉(嘉应),以上入弘文学院习普通,二年卒业;萧遵达(潮阳)入经纬学堂习师范。”<sup>[9]212</sup>可见潮嘉地区对留日师范的日益重视。此外,同年,嘉应黄超如、南海何斌、何毅、何筏,香山李冠麟,澄海林贡宗,新会高炎森、陈伟、邱名荣自费入宏文学院习师范科。

纵观广东留日师范生,可发现他们基本以自费为主。究其原因,

首先,科举未停,传统士大夫仍冀望通过科举扶摇直上,新式学堂难以大范围推广。“1901-1904年间,广东各地兴办的师范学堂和师范讲习所共16所,其中师范学堂或简易师范班共9所,师范传习所6所,私立女子师范学堂1所。”<sup>[14]</sup>当地师范学堂的陆续兴建,能培养一定数量的本土教习。加之“即如上年派往日本学习速成师范之各生,为日甚促,所得无多。而进来接见该生等,其志趋学识已稍有不同,各处之访延教习者,且纷纷指名延请。”<sup>[15]</sup>速成师范科官费生毕业回国及日本教习的到来,亦可支持当地学校的师资需求。其次,重视教育与人才培养的粤督陶模病逝,粤督的更替对广东师范留学政策造成一定的影响。鉴于此,“除上年速成师范外,绝无所闻。”<sup>[16]</sup>于是,两广学务处在《拟请选派学生游学详文》中提出通过考试遴选的方式派送官费生,“拟定赴欧美者二十人、赴日本者二十人”,实际派学人数则视合格人数而定<sup>[17]</sup>。并指出官费生毕业回国后对粤省的义务服务年限为五年或以上<sup>[18]</sup>。此举得到新任两广总督的准许<sup>[19]</sup>。在此政策的作用下,番禺金曾澄、南海卢公辅,三水邓瑞槃以官费生身份分别入读青岛高等师范学校及东京易师文科历史地理部,但官费生仍是少数。

1905年9月,张之洞、袁世凯、周馥、岑春煊等人奏请停科举,广学校,并提出:“师范宜速造就也。各省学堂之不多,患不在无款、无地,而在无师。应请旨切飭各省多派中学已通之士,出洋就学,分习速成师范,及完全师范,尤以多派举贡生员为善。并于各省会多设师范传习所,师资既富,学自易兴,此为办学入手第一要义,不可稍涉迟缓。”<sup>[20]</sup>随即科举被废止,全国各地纷纷设立师范学堂及传习所。又高等学堂教习培养时间耗巨,延聘外国教习并非长久之计。对此,两广总督岑春煊上奏《筹设两广游学预备科造就高等师范折》,提出“拟于广东省城设一游学预备科,考选中学已有根底及普通学略经研究之学生一百八十人,在内地预备两年,精选百二十人派赴日本,直入彼之高等师范学校本科留学。”<sup>[21]</sup>如此,“预备两年,本科毕业三年,五年后即有高等师范可用,优级师范学堂学科大致仿照日本高等师范学校编定。”<sup>[22]</sup>但到翌年,游学预备科不善经营,最后与译学馆合并为方言学堂<sup>[23]</sup>。而原来的120人师范留日生派遣计划亦不了了之。

1906年3月,清廷限制速成师范科的派学。留日速成师范热随之急剧降温。后来,驻日公使杨枢多次与日本文部省商议,希望日本官立高等以上各学校招收中国学生。这便是“五校特约”留学计划。且《学部酌拟日本官立高等学校收容中国学生及各省按年分任经费章程》中明确规定了五校分别招收中国留学生的人数,其中东京高等师范学校的招生人数为25人<sup>[24]</sup>。因预计到2年后参加竞争考试的学生人数不足等问题,学部叮嘱“各省续派中学毕业生前往日本应考入各学校之预科,以备将来各学校考选新生,取材之所”,且“应另(考入预科之学生)自筹学费至入高等后始该给官费”<sup>[25]</sup>。这一政策的出现,一改以往速成教育质量良莠不齐的局面,有效提高了学生的留学质量。1908-1910年间,学部举行了三场五校入学考试,广东考入五校的留学生共计56人<sup>[26]</sup>。

### 三、留日师范生对广东近代社会的影响

首批官费留日师范生毕业回国后,“周起凤到广宁和阳江执教县办的师范传习所(教书)、冯博、詹宪慈、陈柳功、范公说在广府中学当教习,彭金铭、沈藻清、李文榘在高等学堂当监学,冯梁当过东区模范高小的校长,朱念慈、谢祖诒都在番禺高小任教。”<sup>[27]</sup>

此外,“海阳吴君扬兰等募集款项,在七都地方设立师范传习所,以谋教育普及。”<sup>[28]</sup>

陶效勉归国后即入学务处搞教育行政,旋捐纳同知赴桂候补,转入仕途。后入广东省立公法毕业当法官。”<sup>[29]</sup>杨玉衡为“香山县内阁中书,家居时独一提倡兴学为义务,于管理教育诸法均有发明,留心时务,条论亦多科。”<sup>[30]</sup>后任广西镇安知府,1916-1917年任广东揭阳县县长。

此外,由于日本当时汇聚了因戊戌变法失败而亡命日本的资产阶级维新派及思想激进的革命分子,因此,留日师范生中亦有人受之影响,加入其中的组织。饶一梅便是其中一人。

饶一梅在日期间,受孙中山民族民主革命思想的影响,于1905年毅然加入同盟会。回国后回到家乡的松口师范传习所任教。他一面授课,一面传播革命思想。让同盟会的革命思想逐渐在嘉应地区传播开来。

综上所述,广东留日师范生在日接受了速生师范教育、专门师范教育,刷新了他们对教育体制、教育管理以及专业教育的认识。回国后,他们活跃在教坛的一线工作岗位上、积极创办新式学校,传播了新知识,对广东近代教育体制的形成和发展贡献了强有力的力量。

此外,清廷派遣留学生的最终目的在于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但不同省份派遣的留学生中,皆有人在接触了新学后,思想意识及观念发生了变化。广东的留日师范生亦毫不例外。他们的思想在教学、管理过程中潜移默化身边的同事及台下的学生,促进了新一代的思想觉醒。而这一批又一批的新生力量前赴后继地、共同推翻了落后于时代发展的封建王朝统治,并推动了广东近代社会变革的进程。

### 参考文献:

- [1] (清)朱寿朋.光绪朝东华录 第四册[M].北京:中华书局,1958.12.
- [2]杜宏春.陶模行述长编 下[M].合肥:黄山书社,2019.12:1436.
- [3]冯自由.革命逸史 初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1.6:186.
- [4]胡汉民.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国文献丛刊 胡汉民自传[M].北京:中华书局,2016.01:13.
- [5]何正华.广东水师提督李准[M].北京:海洋出版社,2018.01:328.
- [6]章宗祥.日本游学指南:两广卒業留学生姓名录[Z].1904.
- [7]桑兵.清末新知识界的社团与活动[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04.
- [8]章宗祥.日本游学指南:两广同学姓名录 光緒三十年九月調查[Z].1904:2.
- [9]肖文评.《岭东日报·潮嘉新闻》梅州客家侨乡史料选编:上[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8.12.
- [10]肖文评.《岭东日报·潮嘉新闻》梅州客家侨乡史料选编:下[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8.12:400.
- [11]陈芳.清末民初广东师范教育研究[D].华南师范大学,2007.05:25.
- [12]上海书店出版社编.东方杂志:第1册[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2.07.
- [13]番禺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番禺县续志 民国版 点校本[M].广东人民出版社,2000.06:321-322.
- [14]上海书店出版社编.东方杂志:第7册[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2.07.
- [15]广东教育官报:文牍[J],宣统二年第一期第一号:11.
- [16]故宫博物院.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 卷71-72[M].北京:故宫博物院,1932.
- [17]吕顺长.清末留日学生从量到质的转变——关于清末“五校特约”留学的考察[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1(01):86.
- [18]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中华文史资料文库第17卷文化教育编/教育[M].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
- [19]上海书店出版社编.东方杂志:第12册[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2.07:113.
- [20]林忠佳,张添喜等.《申报》广东资料选辑 六[M].广东省档案馆《申报》广东资料选辑编辑组,1995.10:264.
- 项目基金:广州市哲学社科规划 2022 年度课题(课题编号:2022GZGJ277)。
- 作者简介:宋水英(1984-),女,广东广州人,副教授,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日文化交流。